

星期評論

劉英士主幹 第十一期 高良佐編輯

當然還是有其光明的前程

本月十八日中央社發表新四軍抗命叛變，襲擊友軍，經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三氏實施緊急處置，黨將該軍全部解散，編遣完畢，並將該軍軍長葉挺就地槍決，隨奉軍委會令交軍法審判等嚴重消息。一般遠處後方的日報讀者，平常聽慣了精誠團結與「統一戰線」之類使人感覺異常興奮的口號，萬想不到前方還有「槍口對內」的不肖軍人，乘著友軍（第四十師）調防時機，予以襲擊，圖謀「奪取倉庫被服糧彈」，甚至還要「直襲上官（雲相）總司令部，造成擴大紛亂之局，使中央窮於應付」。如今看了軍委會的通告以及該新四軍參謀處長趙凌波供詞，真不知如何痛心！

顧司令長官於敵砲射擊機可遙及之陣地，為此緊急處置，以伸國法而振綱紀，當然是「痛憤無已」；他的痛憤之程度，自有過於衛司令長官之斬石友三兄弟，因為石友三是個反覆無常的漢奸，其被誅也，人人認為痛快之極，然而葉挺則是一個第三國際所極重視的新式軍人，其在外國之聲望且非顧司令長官本人所及，就是中國青年，也有一部分誤信偏信而宣傳，一向當他是個英勇抗戰的健兒，如今見他受到這樣嚴重的處分，定必相顧愕然。

我們到過黃河領域的人，即使不知道蔣銘三如何委曲求全，朱一民如何啞子吃黃蓮，閻百川如何兩眼望青天，也當知道華北方面，在最近三年以來，不斷地發生了許多事件：張蔭梧僅以身免，趙個下落不明，何紹南被趙耀閣殺，山西的新軍整批叛變，以及其他許多計數不清的「摩羅」案件。對於這些，我們始終未聞最高統帥或任何戰區長官曾「壯士斷腸」，足證中央對於叛變軍人，至少在今日以前，難免姑息養奸之嫌。這次顧司令長官對於新四軍的緊急處置，我們希望它是一種整飭和綱的發端。

有許多不明作戰情形的人，以為兩師兄弟鬩牆的兵，戰鬥力勝於一師毋庸後顧的兵，於是主張無條件地縱容叛兵，這真是種荒唐絕倫的謬論。當將法戰爭之際，普兵包圍巴黎，共產黨飛機作亂，形勢比較我們今天所處的環境更為危險，然而復與法國的臨時政府並未因此停止戰亂。所謂「自力更生」之說，必須從消除內憂做起。如有內憂則自力已被病菌侵蝕，何能更生？前線上面的叛軍，雖僅一營一連，其可危害國家的實際勢力，百倍於整個南京城內的大小漢奸。所以史太林對外可與希特勒互不侵犯，而其對內則必剪除紅軍之父托洛斯基的勢力。要如當日之國真有一日實行開戰，我不相信史太林會讓成千成萬的「托匪」形跡，一律加入他的「統一戰線」！然而中國是偉大的，中國人也是偉大的，我們的斷然處置向來只是「懲一儆百」，而非「除惡務盡」。新四軍的大部官兵，經過了改組以後，當然還是有其光明的前程。（英）

號七零六二第維維查審市滬 版出社論評期星 日六廿月一年十三國民華中



新時代的民治理論

中央社華盛頓一月十八日合衆電：參議員格

拉斯稱美國應即對德宣戰。——美國之參戰問題，應由海陸軍部及國務院之專家決定云。

在羅斯福舉行第三次就職典禮之前二日，格

拉斯竟發這樣激烈的言論，我認爲非常值得注意

——至少是與威爾遜之御旨相違，具有同等嚴重

意義。美國是一民主國家，惟國會擁有權對外宣

戰，而今格拉斯却說：「美國之參戰問題，應由

海陸軍部及國務院之專家決定」。這在憲法理

論上面，不可不說是種革命。固然，行政當局

常可製造一種既成局勢，以通議會之宜，但在這

篇談話以前，我們却未聞有任何議會領袖致政，

而且願意提出這樣地違反憲法條文和民治習慣的

決定和戰之原則。這使總統有理由參去一種至

高無上的議會職權。

如格拉斯是個青年政客，這還不足爲奇。

但他是個變態苦目的老參議員，曾任過吉尼亞州

長和財政部長等職，在羅斯福動行新政時代，他

還是個民主黨內反對「獨裁總統」的領袖之一。

英美精神之驚人表現

格拉斯哥十七日合衆電：首相邱吉爾頃在

此演說，謂英國須自海外獲取大批武器船隻及飛

機，用以保護「文明進步之第一線」，而其所需

要者且將超過英國財政力量所能償付之數。時

美專使賀甫金斯坐於講台上，邱吉爾首相即轉而

向賀甫稱，一九四一年吾人向無須由海外獲得大

批軍隊，但確需要武器船隻及飛機。我人所能

償付者，均爲償付之，但我人所需者，實較將

來我人所能償付者超過甚遠。

當那「援助民主國家法案」尚在美衆議院外

交委員會聽取各方意見而尚未提出大會討論的

期間，急切待援的英國首相竟會當著大眾面前，

先發一個率直無比之賴債聲明，這在國際關係史

上，確實是絕無先例的。如果美國會於聆悉該

項聲明之後，依舊通過「援助民主國家法案」，

那末，這大戰爭以後，至少在英美中希四國之間

將無難纏不清之債項問題。

華盛頓十九日合衆電：「海軍部長諾克斯頃

在加拿大協會宴會席上發表演說，謂美國務院

助民主國家，而應中勿堆積殘元殘分之觀念，蓋

人類之命運前途正懸而未決，吾人不應因英國缺

乏美金，而即停止其對英供給英國」。這可證

明美國負責當局已與邱吉爾共鳴。

就對內而言，我們早已喊出了「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這個原則，如今邱吉爾是把這個原則

下，希特勒似能吸頓及亞洛兩省的農田。事

實恐怕是：利用了法蘭西廢棄馬奇諾防線的地

下裝置，如電氣設備與鋼軌之類。如果英德擴

展耕地起見，那就需要破壞而上的水泥工事，

並將水泥埋入地下或搬至別處。這問題經此案直

手續而後恢復的農田，是否預備有到德國人來種

植與收穫？希特勒並未準備久戰！

我們的國際新聞

中國人缺乏國際知識是從很遠上缺起的，專

門供給國際新聞的記者似乎就很缺乏國際知識。

請看：「中央社華盛頓十九日國際電：」盛傳威

爾基由英返國後，將就政府某要職；各方並以威

爾基當選以其競選之政敵塔虎脫氏爲司法部長

之事爲先例云。

自「各方」後一段，原電決不如此謬誤，因

在聯邦政府裏面，根本只有大法院長與檢察長兩

職。此處所謂「司法部長」，不知何指。

高利貸與黑心人

本月十五日大公報第三版渝市點滴中有一條

說：「春節未至，銀根已緊，銀行放款已有高至

二分七八者；轉一過手，則更駭人」。

在這樣情形之下，銀行的儲蓄存款利率，似

也應該酌量提高。我不懂有錢的人爲什麼不直

接放債，而要委託銀行轉放。這可證明資本案

尙屬知足，黑心的是企業家。出了高利來向銀

行借款的人，你放心，決定不是等着錢來買米煮

粥的尋常百姓！

拆毀馬奇諾防線

中央社柏林十四日合衆電：「德方擬將馬奇

諾防線之防禦工事拆毀，以便亞爾薩斯洛林兩省

之土地改作農田」。

輸心國家的糧食固不夠吃，但在戰時狀況之

下，希特勒似能吸頓及亞洛兩省的農田。事

實恐怕是：利用了法蘭西廢棄馬奇諾防線的地

下裝置，如電氣設備與鋼軌之類。如果英德擴

展耕地起見，那就需要破壞而上的水泥工事，

並將水泥埋入地下或搬至別處。這問題經此案直

手續而後恢復的農田，是否預備有到德國人來種

植與收穫？希特勒並未準備久戰！

我們的國際新聞

中國人缺乏國際知識是從很遠上缺起的，專

門供給國際新聞的記者似乎就很缺乏國際知識。

怎樣輸入科學

汪敬熙

那怎樣使我國科學化的問題，我們第一必須澈底覺悟我們處處比不上歐美先進國家；並且澈底覺悟我們之所以不如人家，大半是爲知識不夠。

在工業方面，我國的落後是顯而易見的。重工業從來不曾有過。輕工業抗戰前有一些。但是紗廠和化學工廠，都是設在沿海和沿江各埠，因爲沒有海軍保護，中日戰事一開，便都被摧毀了。現時各地興起的小工業，到了抗戰勝利以後，能否和外國同競爭，尙是問題。說到商業，我國既無商船航行各海岸，又無大規模的經營入口貿易的公司，並且金融一向是大小操在英商匯豐銀行之手。就以棉紗立國之本的農產而言，我國也是落後。絲的市場早爲日本所奪；茶也早被印度和日本的打倒。大江以南，柑橘一種類極多。我國曾有人去做柑橘的選種工作麼？美國加利福尼亞的橙子不是暢銷我國的各大城市？據說，這橙子的種子是在我中國選去的呢。交通方便的大城市居民，近年甚至要吃外國運來的米麥。現在只剩下桐油是我國的特產。但是消費桐油多多的美國，業已設法種植桐樹和找尋代用品了。我國石炭蘊藏極富，但是已開採的大煤礦不幾個呢？錫礦也是很多，但我們自己曾不肯由礦石中提純錫提出來呢？我們有沒有大規模的煉錫廠呢？生產落後，那就無怪我國一般的生活標準之低下了。看到內地農民生活之苦，那個人心裏不難過？「衣食足，然知榮辱」。而今我國同胞的生活，絕對多數是在飢餓線上！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們實難空談我國的文化。

我們需要購買外國的機器。我們所出的價錢，實比材料及工資的總數大得多。只多出的錢，依照德國物理學者謝德基的說法，就是所謂「智慧酬金」。我們爲什麼要出這種「智慧酬金」？當然是因爲我們的知識趕不上外國人。我們自己做不出來，只得向人家去購買。

現在我們自己雖能製造一些可用的機器，但是精細的仍然不會自造，必須仰給於國外。工業，商業，農業，礦業的人才，尤其是居指揮地位的組織人才，都須到外國去受訓練。我國的公立大學——培養人才的總機關——不是借用外國的人才，就是找那曾在外國受過訓練的人來當教員。一直到現在，我們還不能完全在自己的大學內訓練專門人才。甚而至於普通機器的使用法和商業記賬法，也都須從外國學過來。這些事充分證明了我們知識上之不如外人。

知識不如人是我國商業衰頹，商業不振，有錢不能開，開出鑽石不能鍊，而工業建設亦感特別困難的根源之一。我們對於這個缺點，必須深自引咎，深自切責，而後才能奮發有爲，輸入科學，以之改善國民生活。

自從清末張文襄公之倡「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葉德輝之輯「翼教叢書」算起，中間經過民國十年後梁漱溟先生之爲談中國西洋印度三大文化，直到最近幾位上海名教授之倡議建設中國本位的文化，和張君勱先生在他那本讀書不化議論叢書的「立國之道」內狂吹中華民族的文化——那似乎是根本上不承認我國在知識上是落後的了。這些議論，直接的或間接的，都是輸入科學的阻力。

我們承認自己的不如人，並不是「畏他人志氣，減自己威風」；我們只不願意謙淡忘。在馬可波羅航海時代，我國社會程度是在歐洲之上。造紙術和印刷術的發明，尤有造於世界文化的傳播。但是祖宗的光榮掩不住子孫的落伍。我們若只誇耀祖先的成績，而不自己埋頭苦幹，便將永無前進之日！

第二，我們必須不只空口說白話的提倡科學，而要實實在在的做。現在六七十歲的人主張中國科學化，總是偏重富強強兵。開辦，

造船，練兵，修鐵路，辦工廠，造鎗砲，飛機，都是他們熱心提倡的。可惜他們知識太差，只知道這些事應該辦，却不知道怎樣去辦。並且因為知識不夠的緣故，他們也不能夠找到適當的人才來替他們辦這些事。結果，他們多數是失敗的。

現在四五十歲的人，見解比較進步了，他們中間，有些以為科學在基本上是一種求知的方法，是一種思想的方法；要使中國真正科學化，必先輸入這種思想的方法。這話本來不錯。可惜主張此說的人只有極少數真能實行，真能做個榜樣來給人家看，並給人家學；大多數只是說而不做。我知道有些中國的所謂科學家，在外國求學時代既未做過研究，回國後更是有動手，滿口雖說輸入科學方法，言行却不一致，他們只讀一些通俗的科學書，練幾個大字，做一二首舊詩。這種人對於輸入科學能有什麼貢獻？

還有些人主張專門提倡應用科學。他們以為外國已有的成法，種類已經很多，我們只要學會了這些法子，盡量利用，便可以建設各種事業，達到科學化的目的。這一說似乎「言之成理」，可惜也是錯的。就以利用外國的成法而論，沒有基本的訓練，沒有研究的精神，也不能使這些成法適合於中國的情形。試舉仿造玻璃為例。如用外國的材料，自然可以利用成法來造出那與外國產品相差不多的玻璃。但若要想改用本國出產的原料，那就非先從事一番研究工作不可了。所以一個工學院，農學院或醫學院畢業出去的學生，在他做事的時候，如果真想用心做，而不敷衍了事，那就定會感到理論科學的訓練和知識的必需。若欲更進一步地使我國人能自動的改良成法，或另發明新法，那就更須具有堅固的理論科學的基礎。其實，理論和應用科學，根本上原無區別。英國的生物學家霍爾頓曾經說過，真正科學家看不出理論和應用科學的差異，祇有那些「半瓶醋」者纔把它們分辨得清楚之至。

提倡應用科學一說，現時似乎是非常的有勢力。它的第一個結果是把多數學生驅入了工學院，而使理學院的學生大大減少，減少至於可驚的程度了。這是一個很可憂慮的現象。我國近年在算學，物理，

化學，地質學和生物科學方面，總有一些基礎，而這些基礎亦尚未鞏固。為了保留日後發展工農醫等事業的根本起見，我們希望這一些不很穩固的基礎，不要全被那些提倡應用科學的人摧毀無遺。

我們如果仔細考察主顧這一說者的經歷，則也可見他們無論是在過去或現在，大多數不曾做過任何事業，並且缺乏任何獨立研究的經驗。他們大多數也是說而不做的。

口頭和文字的鼓吹是沒有實效的。空談的鼓吹只能產生一些「科學八股」。絕對不能輸入科學。至於錯誤的提倡，更可產生那與預期相反的結果。時至今日，但用語言文字以提倡風氣的時代，實屬白過——我們需要實際做工夫。真正能使中國科學化的，是在實驗室內工作的獸子，和在各種工程，農藝，礦業，醫藥衛生事業方面努力做事的人，絕對不是到處講演和寫各報風言文章的人！

第三，我們必須愛惜使用現有的人才。

「才難，不其然乎？」孔夫子這一句話正足以表示現在我國缺乏人才的情形。無論那一方面都有一些事業等待着建設起來；無論那一些事業都是苦於找不到適當的人才。然而同時失業的人，尤其是失業的學生，確是不少。這個奇怪的現象，原因複雜，我們限於篇幅，不去分析。不過我們要特別指出來，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實在必須愛惜使用現有的人才。

人的精力總是有缺點的；我們絕對不應該把許多事務都推在一個人身上。要一個學科學的人在學校內每週授課八九小時，同時還做學生的導師和從事研究工作；在研究機關內同時要做研究工作和辦一些無聊的瑣碎的行政事務；在政府機關內同時要負許多事業的責任——事實上是不辦不到的。還有那些應酬式的講演，和那費時失業勞民傷財的宴會等等，都耗費了我們幾個比較有名則科學家的許多有用的時間和精力。

一個人所做的事，是受他的才能，訓練和興趣的限制的。我們絕對不應該不顧這些，硬派現有的人才去做他所不能做，不配做或不願做

兩事體。有許多人才就是被毀壞在這種使用失宜上面。更可惜的是人才雖已犧牲了，事業却未辦好。

無論是做什麼事情，都必須在長久的期間以內，享受充分的行動自由，纔可以有所成就。我們對於別人的事業，絕對不應該隨便批評，隨便干涉。同行人的商量討論，負責任的建議批評，當然是於工作有利的，但是普通行政長官對於所屬技術人員的指示與訓話，却常反使事業不易成功，甚至要使事業弄糟。

以上所說的話，都很簡單，都很淺顯，任何人都知其為當然，但在人少事多，時促事急之際，却常有人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就置這些淺近的道理於不顧。「往昔不可諫，來而猶可追」。我們希望嗣後中國社會對於難得的人才，必須愛惜備至，使用得宜。

第四，我們必須注意培養人才。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詳細的討論非我所能；此處只可舉出幾個原則來討論。

我們現在需用的各門科學人才不但數量很多，而且需要很急。因這道線，如今有種種粗製濫造以應急需的傾向。據報紙記載，去年國內高中以上的學校，已經超過一百個單位了。學校辦得愈多，造就的學生自然也是愈多。但是畢業生的程度如何？在抗戰期間，外匯必須節省，運輸也是十分困難，原有各校已感很不容易供給學生實習和教員研究的材料，新設學校的設備當然是更難免因陋就簡了。我曾親眼見過一個大學裏面新添設的化學系內既無一架可定量分析用的天秤，也沒有一隻精細的量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學生怎樣能學化學？且在人才缺乏的我國，現在實是沒有方法去找辦一百個高中以上的學校的數目的各種專門教師，就是聲望最高的大學當局，如今亦都感受良師難聘的苦楚！這問題尤比物質設備之不全嚴重得多。所以多設學校以應急需的辦法，一定不會產生良好結果。

從前美國在加州發現金礦之後，人民大量的向西方移動，在原來荒涼的地方，幾年之間建立了許多新城市。新城市增加了醫生的需要，而且需要甚急。因而許多醫學校就像雨後的筍子一樣，轉瞬之間就設

立了。這些學校既無合格的教員，又無相當的設備，當然不能造就高明的醫士。但因他們是很適合目前的急需，所以政府和社會都無法制止。經過了十年的時間，許多人的努力，纔把這些不三不四的醫學校淘汰淨盡，而使美國的醫學教育，復依正軌發展。

只顧目前的急需，一定貽誤於將來！何況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就是目前的所得，還是有些問題？

爲了適應目前的需要，同時顧及將來的發展，我們對於人才的培養似乎可以採用這種辦法：就是儘量減少現有高級學校的數目，而將人力和財力集中起來，姑先辦好一兩個大學。減少高級學校的數目是使所需教員的人數不至太超過了現有的人才供計量。辦好一兩個大學是使國內的人才之培養有其基礎。

也許有人要說，我國的領土是怎樣廣大，人口是怎樣繁多，而且辦好一二大學，似乎也太少了。於此，我們請再略述美國醫學教育的經驗，用以證明辦好一二大學確是提高一般程度的捷徑。美國醫學教育的改進，歷史家公認是以約翰霍金斯大學醫學院之設立爲其關鍵。這一個學院創於十九世紀末年，彙集了許多權威學者，努力研究工作，發明新教學法，完全改變了醫學院的風氣。不久，其他的學校都學這個醫學院的榜樣；由這醫學院畢業的學生供給給了各醫學校所需的教員。再就美國的大學教育史說，它的程度的提高，也很得力於該大學的成立。這大學的第一任校長吉爾門先生，首先創立了一個新式的大學，後又開辦那有名醫學院。他彙集了當時美國有希望的青年學者，鼓勵他們從事研究工作，建立了美國第一個以研究爲最大責任的大學。他改變了美國大學的風氣，並使美國造就了大批的專門人才。因此，有一位著名電氣工程師普賓先生在其自傳中說：「每一個有錢的美國人，在他的遺囑內，都應該捐一筆款給約翰霍金斯大學，以紀念它提高美國大學程度的功績。美國的輝煌是這樣，我們正可以學它。」

如果我們真能夠把全國學術界中最出色的人物聚在一起，那就不是辦好一二個大學——以求人類知識進步爲其目的的大學。欲達到此目的，我們還需要一個重大的附帶條件，即必須給充分的研究自由於此一

二大學。社會科學的研究，因影響太多，在世界各國都是難得自由，然而自然科學和生物科學的研究，則必十分自由。唯在自由的空氣之中，科學才能發達。德國的大學一向有傳統的教學自由。這種自由並沒有毀壞了德國的大學，反而使德國的科學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繼續不斷的有光輝燦爛的發展。希特勒執政以後，根據他那種民族學說的理論，干涉大學。猶太種的教員都被趕走了；猶太青年也不准入大學之門。畢白拉克發現算學中有「猶太算學」；倫拿德著了一大部「德國物理學」！希特勒並且主張專制研究實用問題。理論的學問被忽視了。據說歷迫這樣的重：德國的大學教授遇到外國朋友來臨，必先請他走到家內，鎖上房門，看看窗外和門外是否無人，纔敢說一二句

聽了教育部長的談話以後

教育部長陳立夫先生最近光臨嘉定，在十二月廿二日上午借立武漢大學大禮堂，與在嘉各國立專科以上學校的教職員舉行談話會。到會者約三百人，當時濟濟一堂，的確是嘉定年來稀有的盛況。部長談話約歷二小時之久，而「概觀」集在嘉的導師們，統一學制與改革學制的用意及方針。我們二三年來林守定一團的人，此次得見政府當局對於全國教育方針與計劃，使我們從事教育的人得所秉承，實是一大幸事。

導師制與統一學制是教育部三年以來兩大新猷，兩大政策。在大體上說起來，這兩種政策都有它的特別立足點，而是從教自五四運動以來國內教育漫無標準而趨於良劑。當這兩種政策開始施行的時候，評論者頗不乏人，但我個人則以為應稍假以時日，從實施經驗中間看出它們的得失，然後尋求修改的方案。部長在談話裏也十分誠懇的表示同樣的見解。現在這兩種政策已經實施過了相當的時期，我個人也從耳聞目擊和親身經歷中見到幾點。因為沒有機會和當局面談，若用公文書來建議，又覺太過鄭重其事，祇得在此略加申述，以供有關當局及一

實話！教學自由不在了。非猶太種的學者們也漸漸離開德國了。德國的科學已經開始走入衰頹的途中了。義大利統制學術的結果，也不見佳。至少自然科學和生物科學是不可不有研究自由的。辦好一二個以研究為第一責任而有研究自由而生氣蓬勃的大學，是培養人才的根本辦法！

總而言之，輸入科學不是徒憑空談所能辦到的。要想輸入科學，必須使在各種事業方面做事的科學人才可以盡其所能；必須使在實驗室內研究的人可以安心工作；並且必須有個生氣蓬勃而重視自由研究的大學去培養人才。這幾點如果辦不到，空談是毫無用處的。

袁昌英

般注意教育者的參考。

導師制在實施方面的種種困難，當局宜早洞悉其中原委。在武大方面，實施的成效實在不能算大。在初辦的時候，有一部份教授確實切切實實的努力過，用聚餐，野宴和旅行等方式，期與學生發生相當親善的關係。另有一部份則感覺此種辦法諸多不便，就只採取了茶談的方式，一學期中約定與學生會談數次。在見面的時間，不用說得，各教授是很客氣氣地詢問各個同學的家庭狀況與學業自趣之類，甚至於導師賜一長篇談話，指示做人及為學之道。然而分手之後，復又兩轍北轍，彼此不往還。學生散居在各宿舍或公寓，教授住在家裏，彼此的私生活無從明瞭。若要導師常邀學生到他家裏去，不特教授自己感覺種種不便，且恐引起家人的不安。況且一個教授，除了上課，閱卷，監視實習，讀書，著述，處理家事，教育兒女，以及其他社會活動以外，如尚須常與其所指導的學生周旋，則除他的健康資本特別雄厚，大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形勢者外，精力上也是不容許的。中國知識階級裏面，究有幾人能夠誇耀這種資本雄厚的體力，然值得我們

注意的！

就是時間精力都屬可能的話，我們還不能不顧慮到一個彰明較著的事實，那就是：有些教授，學問固然很好，但是生性豪放，不能泥守世俗的常規，又或文采風流，習慣疏懶，既不能，也不願，兢兢業業地導人於聖道。這種教授的學問，當然是學生們應該領教的，可是他們的品行，却不一定能青年們願意仿效的。況且人心之不同如其面，倘若硬要十幾個青年在長長的四年之中，老是追隨着二位性學問也許都不十分相合的教授，或通一個篤實忠厚的教授對於十幾個性格不同的青年，負着他們終身學業及其行為的責任，這其中的苦楚，無言是極那方面看，似乎也有些吃不消的。

就說是實行教育的大使命起見，吃不消也得吃吧，但是一個大學生，既不是呱呱墮地的毛孩，也不是剛剛負起書包來上學的小孩，他的品性與習慣，已隨着二十一年來的二十年左右中間，被其家庭學校和社會環境養成了一个相當的定數，不特素不認識的大學教授不能使他更改，就是他的父母兄弟，也恐不能對他發生多大影響。所以鄙見以為與其硬學，倒不如開導。就是不責成中小學校嚴格執行德育訓練比較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是要在大學裏實行導師制，最好還是採取自由選擇的方法，比較便利而能收效。

但是這又有一問題。大學不是不能夠講求教育的存在；相反地，它是一個培養人才，把高材生培養好場所。「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偉大使命，應當自由學習負責，不特執行時候，似乎不必採用固定形式，儘可以仿效古人所謂「游移默化」或「不言而教」的暗示方法，以使得那些十分勤直好學的青年，得在「一種」看真跡的純潔氛圍裏面，接受那些承我國數千年來精神立國而又實為我們今日所必需的道義文化。文化的長點就是「總理指出」的「孝悌愛忠義和信」，也就是「總理所指出的」四禮義，相廉恥，負責任，守紀律」。可是風氣之養成，並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必得有一部分大學教授，確確實實地承當得起「一代師表」的尊稱，且盡學生之精力以赴之，始克有濟。培養一個國民的道德或學問，正如栽植一枝花木

一樣，自其發芽以至成長，無時無刻不需要人家的盡心與竭力。如果一般的家庭和中小學校都能注意灌溉，注意施肥，注意防止病蟲害的摧殘，務使他們所培養的幼苗，枝幹正直，周身健全，那末，到了大學裏面，只要給以適當的陽光，調勻的雨水，便可使它生氣蓬勃，欣欣向榮，開出如意的花，結成碩大的果。倘若家庭和中小學校方面，忽略了前一部分的工作，而要大學來下根本的改造工夫，那恐怕是不能達到理想的期望吧！

關於統一學制一點，陳部長所持的理論非常透澈，大要是說：自從維新以來，我國學制四分五裂，漫無標準，大受各帝國主義者以半殖民地看待我國，受用文化侵略政策的影響。英國留學生或英商教育所創辦的學校應用英國學制；美國的，法蘭西的，德國的也都依樣葫蘆，各仿效其有關係國家的學制。那種情形當然不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所應有的，所以教育部在幾年前竭力圖謀全國學制的統一，希望創造一個道地的文化系統。教育當局這種眼光宏闊氣魄偉大的見解，以及苦心孤詣的籌劃，我個人對之，當然是很感覺同情與佩服，而不能再表示任何異議的。

關於改革學制一點，陳部長指出了二三十年以來我國高等教育上的一大病病：就是過分的注重外國化，而太忽視了我國固有的學問。有些學者且專研究一門學問，致易發生偏見，缺乏普通常識。這種教育的結果是：現在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對於外國情形或某一種學科，常能說得頭頭是道，十分清楚，而對於本國國情以及與其自己所治某一學科有關的我國固有學問或常識之類，却反難免印象模糊，非常隔膜。所以每逢一個對於國情有關係而與一般局面不能分離的問題發生之時，那些西化太深的專門學者就感覺無法應付。且以一偏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在社會上占有相當地位，而竟不很明瞭本國的情形，甚至缺乏普通常識，實在也不是種健全的现象。所以教育部了剷除這種弊病起見，特將學制改變，要使大學一二年級的學生，抽出一部分的時間來專修關於國情研究以及普通常識的科目。對於這一點，我也十分表示同情。記得從前在英日讀書的時候，遇見許多不知是從那裏出身而自學，自己

對於中國的文化根本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而常常對着外人的面前，說中國的一切，甚且發出缺乏常識的論調，在外人面前丟臉，當時氣憤的情形，至今猶未完全忘却。現在教育部對於這點，積極想法補救，我個人當然是認為可以慶幸的。

可是細察各方情形，自從國民政府成立以來，歷任教育當局莫不厲行改進，前述那種缺憾，現在似乎已經不復從前那樣的嚴重，更不像從前那樣的危險，所以「矯枉」手段，如今應該避而「過正」。我們希望每一個大學生——未來中國知識階級的中堅分子——對於本國文化都有澈底的瞭解，因而發生愛護尊敬之心，那當然是種天經地義的原則，誰也不當提出異議的。然而有普通科目，如國文、史地、數理化、生物學及公民科中的社會政治經濟與法律大意等等，都是中學階段應該教好的科目，除了專習這些科目的學生以外，似乎沒有重溫一遍或深加研究的必要。惟有那些關於精神或思想方面的科目，如哲學、倫理學及心理學等，在中學裏並未教過。要是將這些科目定為大學一二年級之共同必修科，那末，它們所占的時間就很有有限，而可騰出大部分的時間來學習專門科了。惟在抗戰期間，經濟上既有困難，設備亦不易週全，中小學不能盡其應盡之責，教育部想請大學來亡羊補牢，當然也是事非得已，情有可原，我們自不能不表示同情而復予以合作的。

可是新學制爲了這點，無意中將全國高等教育的程度降低了一年半甚至兩年，在目前也許還不感覺它有多大關係，但在久遠的未來，恐怕是要發生很大的影響的。記得從前有一位英國教授，在講英法學制的比較時，對我們說，按照實際情形，法國的中學程度確比英國的高出一二年，如哲學與經濟學等增加常識的科目，法國青年都在高中內學習，而英國的青年則須等入大學後才得領略。可是法國的中學畢業生須服兵役兩年，其後升入大學，不特已將從前學過的科目遺忘殆盡，而且因爲閒散久了，一時不免致任心惰來研究學問，所以英法大學生的程度，以及其所反映的學術水準，也就相差不多。要是有那種裁長補短的法國兵役制度，英國就非皺着眉頭去設法改善它的學制不可！我還記得那位教授說及這一點時，他的面部表情，似乎頗以英國之能倖免落後

兩年爲可慶幸。我們立國於此學術競爭異常激烈的二十世紀，對於任何一種專門學問，雖然不便增加教學年限，加速趕上人家早已走過的路程，却也似乎不必減少教學年限，以使各門功課無法授完或學完。我以此今後若要解決這個困難，是應該從充實中學內容，提高中學程度着手，而決不可降低大學程度！

新學制從學生方面看起來，還發生了一點小小的影響，這裏也不妨提及。凡是初入大學的青年，大都懷着一種很熱烈的憧憬，以爲大學教育不知如何特別，高深學問不知如何神祕，可是不久以後，却發現了許多必修科目實與中學課程無甚差異，並不怎樣高深，怎樣新奇，於是就不免因失望而對大學教育發生一種忽視的心理，甚至於對高深學問的研究也就不感興趣。雖然大學裏面所講的普通科目，大部分與中學裏面所教的有些深淺之別，可是年輕人一時不易看出，他們只覺得隔夜飯不很好喫。大家抱了這樣的心理，聽講時便會感覺索然無味，而曠課的舉動也就很不容易避免。曠課較多的結果是：聰明者的學業成績，雖多可以及格，而總帶了幾分敷衍性質；至於魯鈍一點的，就難免受補考或留級的懲戒。在這種情形之下，努力上進的心思，也就不知不覺地日漸淡薄起來了。等到升入三四年級，可以學得一些專門知識的時候，却已積重難返，不易更改他們那種早已養成了的惡劣習慣，一時難得補救辦法。我們常常直接的或間接的聽到一二年級學生對於功課感覺輕鬆，或對聽講感覺乏味的論調。其中有些特別用功而又願意自修的青年，固然可到圖書館去尋書閱讀，但因暗中摸索之故，總不免於走錯道路，事倍功半。至於那些玩心較重的青年，就不免要將許多寶貴的光陰虛擲在無益的娛樂中去了。這一點小小的影響，也許沒有多大關係，因爲好學生在無論什麼情形之下，總是發憤讀書，而壞學生在任何學制之下，總是不肯盡心竭力以求上進的。但若學校方面能夠不給他喫隔夜冷飯，使無藉口之詞，而同時又有新鮮飯菜來開其脾胃，那末，未來情形的轉變，也許會向更可樂觀的一面。

注意

本期出版後適逢春節，自編輯室至排印房均將休息數日，故第十二期勢必緩出數日。謹此預告。

培養大學生的法治與自由精神

王書林

教育的目標，不祇增加知識而已；偏重知識的發展是我國近代教育失敗的主因。科學的方法告訴我們，知識與訓練是同等重要的，在學習之時，訓練更為重要。以游泳為例，博覽游泳術一類書籍的人，落水仍然溺死，而有游泳訓練的人，未必都會談論教人游泳的書。學校中教授理化等自然科學，必須要使學生去做實驗，實驗的重要性即在訓練。從「做」裏面去「學」是教育上一個重要的原則。

再從心理學的立場看來，教育是種「歷程」。一個人的身心，在任何環境中都會發展，但其發展的結果，未必都合我們的期望，因為不良的環境，常會產生不良的結果。所以教育的設施，應該着重於佈置一種特殊的環境，控制一個青年的生活，使之發展成爲合乎現代理想的人格。

根據上面的討論，大學中除了灌輸知識和傳授技能而外，還應當顧慮到怎樣去發展學生的人格，並使他們發展成爲何種人格。依據筆者的主張，大學似應佈置成爲一種尊重法治與自由的完美環境。法治與自由二者，同爲民權主義的基本觀念。這兩種勢力必須平衡發展，而後社會有進步，個人得安穩，稍有偏頗則流弊百出。近代新興的獨裁國家，如德意和蘇聯，不能說沒有法治，但自由則被犧牲了。這些國家不是我們的模範。我們所要建立的家是一個尊重法治與自由的社會。要達到這個目的，就教育言之，必須在設施中就先佈置着這種環境。但在目前中國的大學裏面，我們却是見到一種要不得的現象，就是學校當局常以法爲壓制學生的工具，而學生則以爭取自由爲反抗學校的口號。學校當局與學生之間，似乎必須發生衝突。衝突之結果，若爲學校當局之勝利，則不論管理如何完善，學生總是被動的；若爲學生的勝利，那末學校便變成無法的場所。不論那種現象，無一不是違背了教育的原則。在這些環境中間生長出來的學生，其不能負起建

立法治與自由的社會之責也甚明。大學內的所謂法治，不單是指管理。管理是自上而下的，被動的；但法治則於立法之時，不妨採納學生的意見，惟此意見之表示，必須經由正當的機構，而且學生的行爲大部分也應當由自治的機關來詳爲規定。所謂自由，也不是漫無限制，法的制裁仍是必需的。學生的行爲，如果不受指導，便易流爲盲動或暴動。青年之入學校，爲的是學習，而學習必須有人指導。學校當局應在指導的立場上面，使其學生的人格於各方面都能自由發展。自由若被過分限制，可以引起忿怒的情緒，到了忿怒的情緒變成行爲之時，理智就失去了控制的能力了。我國過去祇重人治，法治的精神從未養成。在管理的環境之中，合理的自由習慣也未養成。所以在各各大學中，我們所見的現象，不是無自治（在嚴格管理之下），就是無紀律（管理失了控制）。這都不是應有的教育環境。

法治與自由並重的精神，是大學生人格上最高的表現。要培養這種精神，僅憑知識的傳授是沒有很多益處的。習慣的養成纔是主要的關鍵。我們若說現在的大學生沒有關於法治和自由的知識，我們是太侮辱了他們的智力。但若我們說他們還沒有真正養成法治與自由的習慣，則恐甚合事實。要培養這種習慣，學校必先成爲尊重法治與自由的環境纔行。

宜昌三遊洞與辭修長官立三主席籌戰守夜中

委員長遠訓機宜遂至天曙感念敬紀 王陸一

不忍山行見夕曛，杳然流水去云云。曠場住久春相勸，草木聲多戰已聞，尚檢兵符催六郡，定回天步仗孤軍。夜深頻降元戎語，讓爾向來大營雲。

對於大學中國文學系的一點希望

朱東潤

抗戰以來，戰區的大學紛紛西遷，在圖書和其他設備方面，都蒙到了鉅大的損失，因此在工作上，便難免一時陷入停頓狀態。各學系都是如此，中國文學系當然不為例外。因為希望中國文學系能和其他的學系一樣，振起時代精神，重新向前邁進，不致形成其他的學系向前，而中國文學系向後，其他的學系是現代的，而中國文學系是古代的那種現象，所以我在這裏提出一點希望。

第一，現代的學術應當具有世界的意義。這句話應用到這中國文學上面，似乎有些牽強，其實則中國文學之不能離世界文學，正和中華民國不能脫離世界一樣。倘我們能把我們的國家脫離世界，那便不用憂愁敵國的侵略，不用努力抗戰和建國，省去了一切的煩惱和艱苦；然而事實上是辦不到的。學術和文學也是如此。今人說，「學術無國界」，古人也說「文章天下之公器」，就是這個意思。二十八年教育部頒布大學中國文學系必修科目表，規定二年級有外國語或西洋文學史六學分，真是一件很開明而值得稱許的主張。一間閣到窒息的屋子總應當打開窗戶，放進一些新鮮的空氣。我們要從這個科目裏，使得中國文學系的學生不致永遠坐在井裏，却去領略一下外國文學裏的詩歌小說戲劇以及傳記的風味。小雅說：「他山之石，可以為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左傳也說：「光澤而自他有耀者也」。這些都是聖經賢傳中的言論，不是個人一偏見。至於這個科目是否真能做對它所擔負的工作，則乃有待於教育當局的首肯選用。

就是專門研究中國學問的人，似乎也不能不知道一點外國的學問。從六朝到隋唐，大寺院裏常有梵經梵律的傳習；高僧的傳記中也留下了「翻經大德」和「證梵語梵文大德」的名號。在大家對於這一大段時期內佛教徒在中國思想界佔據地位還沒有公開發認以前，我固不敢引為同證，但是有力的證據還是不少。

劉勰的《文心雕龍》在中國文學上的地位是無從否認的；他在論說篇稱「般若經境」，在總術篇說「圓鑿區域，大判條例」，也都是些外來思想。唐末僧守溫的三十六字母來自西域；中國聲韻學的基石，一部分竟出於外來學問。這些都是不必詳言而且無可諱言的事實。

全謝山《歸琦亭集》卷二十八劉勰傳說：「勰莊嘗作新韻譜，世皆曰華嚴字母入，而參之以天竺陀羅尼，泰西蠟頂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女直蒙古等音，又證之以遼人林銜長之說而益自備。同時吳昌齡自謂蓋韻以後第一人；繼莊則曰：『是其於天竺以下書皆未得通，而但略見華嚴之旨者也。』」我們看到三百年前的學者對於外國語言是怎樣地致力，還說說外國語和西洋文學對於中國文學不是很重要的嗎？

部定中國文學系的科目中間，還有傳記研究一項。在西洋，這是新史學的一大宗；在中國，專門研究傳記文學的人，似乎還不多。要拿史記漢書的列傳作為傳記來研究一番吧，在史傳方面稍下工夫的人都會知道史傳因為互見之例的運用，和史家的苦心經營，每篇都成為全書中不可分割的一部，而不是獨立的傳記。這便和傳記的原則不同。其實中國的傳記還是有的。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傳類首先列着二百一十七部，一千二百八十六卷。唐宋元明的記載姑且不說。清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傳記類，著錄的六十部，九百三十九卷；存目四百一十部，三千一百九十四卷（內十二部無卷數）。這裏面固然許多算不上文學的書，但是傳記文學不是沒有。我們最好自傳如法顯行傳，最好的傳記如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和中世紀西洋傳記文學相比毫無愧色。但自唐宋以後，我們的文人很少從事於傳記著述；偶或有之，也把他人的精力集中到那年譜上去。從宋人的杜詩年譜和韓文年譜開始，直至清人的阿桂年譜與玉畬生年譜箋註，都不能不算是有名的著述。然而究竟不是傳記的正宗。於是中國的傳記文學，不能充分發展。恰好

西洋的傳記文學，從十八世紀以來，發生了絕大的變化，一部約翰遜傳士傳奠定了傳記的天下，從此傳記成爲文學的一大宗。本世紀以來，維多利亞女王傳出版，於是新傳記文學又開始抬頭。在這方面，重要的著作便有好多部。我們要爲中國傳記文學打開出路，對於這兩度的潮流，便不能不深切認識。我們對於西洋學術要迎頭趕上，這也是一個例。

傳記是一個不被大家注意的部門，所以舉這個例。其他像詩歌，小說和戲劇方面，我們當然是各有相當成就。但是已往的光榮止是已往的光榮。要拿這百年來我們的創作和西洋的創作比較一下，那又怎麼樣呢？研究文學的人總不能和鴉鳥一樣，在疑難到來的時候，把頭朝沙土裏一埋，就此「鴉子不怕雷響」，解決一切問題吧？我們要知道外國文學的進展，然後纔能決定我們的動向。所以大學中國文學系對於世界文學便不能不有相當的認識。我們不一定要接受，然而總不能不唱唱，消化，使一般的世界文學，供給我們必要的營養。中國的詩歌，小說和戲劇，都曾受過印度文學的影響，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中國文學不能和世界文學絕緣，正和中華民國不能和世界絕緣一樣。

其次，現代的學術應當有理論的基礎。理論是從思想出發的，沒有思想便沒有理論；沒有理論便沒有合理的發展。知難行易的學說，是我國二十年來最重要的發現。經過了這個訓示，我們應當更痛切地認識理論的重要。不知固然也能行，但是惟有澈底的知，然後纔有澈底的行。理論是事實的根源，在其他一切學問中是如此，在中國文學中也是如此。

有人說：中國文學要什麼理論呢？從前不是說過「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話固然是有的，然而事實未必如此。「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這是詩。「板寮尿流急，坑深糞落遲」：這不是詩。平仄腔調是一樣的，而有是詩不是詩之別。爲的什麼？「綠草當門長似柴，當中留得一條街」，韻律偶管和唐詩一致，但是這是宋詩。又爲什麼？「傷風須用小柴胡」，這是歌訣，而不是詩。又爲什麼？你說這是氣象興趣不同。不錯，談詩要講氣象興趣，

這便是理論。

有時因爲某種理論不成熟，就不會產生某種文學的佳作。姑以傳記文學爲例吧。傳記文學，原本寫得不內行，所以紀昀評爲「約略依稀，無甚價值」。劉勰的史通，內行雖是內行了，但是他給的是史傳，不是傳記，主題不對。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有傳記篇，據古人所作傳記，多不立論，期期私意，不好採擇，其他並無卓立的見地。中國傳記文學的理論不發達，完全由於大家沒有意識到傳記文學的特點。那麼，傳記文學的不易發展，是必然的結果。

就散文方面說吧：清初魏叔子提出積理鍊辭的理論，這是一種有力的主張。方望溪昌言義法，自稱有物有序，話雖沒有什麼新，在理論方面，完全是「先王之道」那一套，有序之言雖多，有物之言甚少。直到惲子房重新提出魏叔子的主張，換了一個說法，「文集之義，當起之以百家」。他做兩八篇一代因革論，我們不能不認爲重要文章，因爲他有見識，有議論，邏輯的發展，有決定的結局。這更可以說到理論和作品的關係。

在大學中國文學系的科目裏，理論的科目便是文學概論和中國文學批評，這次都定科目表定爲選修，其實要是重視理論的基礎，就都應當放在必修科目裏面。縱然在說明裏面，原說學校當局仍可以改選修爲必修，但是惟有開明的當局，纔能有正確的認識，爲必要而運用。所以仍宜由部重行改定。

文學概論應當放在大學二年級的科目裏，最好由資望較深，講見闊通的教授擔任。正如錢賓四先生最近在大公報提示的，大學教授與其專而不通，無專通而不專。一個講見闊通的人擔任專門提綱挈領的科目，纔不會犯專狹固陋頭重脚輕的毛病。我們不希望他對於每一部門都有深刻的研究，但不能不希望他對於每一部門都有正確的見地。他對於各科，都應當給一個適當的估價，自己認識，也領導學生去認識。這樣纔能完成學概論的任務。

其次，中國文學批評這是一門純理論的科目，沒有一些索養的人或許不能瞭解，所以應當放在四年級的必修科目裏。它的重要和史學

系的歷史哲學，史學方法，法律學系的法理學，經濟學系的經濟思想史一樣，不應當加以忽視。有的人以為中國文學批評止是一部劉勰的《文心雕龍》，這句話便忘去了劉勰的時代。在他著書的時候，他沒有看到律詩，詞，散曲，小說，戲劇；甚至七言四言詩句，他也止看到了寥寥的幾首，他能給我們什麼指導呢？就是散文，連一個鼎鼎大名的司馬遷都沒有引起他的注意。任憑史公受罪了六個月的羶棍，直待韓退之來發現這個天才。那麼，我們要認識整個中國文學，以及領導以後的發展，是否專讀第五世紀一個作家的一面之詞就可以滿足呢？我們要知道惟有正確的批評，纔有正確的認識。有了韓子居的主張，纔知道議論文章應當注重思想；有了劉才甫的因弊求氣之論，纔知道好的文章是一種超

田賦徵收實物問題之檢討

劉君煌

我國今日之田賦，一般徵收貨幣，只有少數徵收實物。最近行政府以救濟軍民糧食平均民衆負擔爲理由，議決各省田賦得徵收實物；並聞各地即將於三十年度實行。此實田賦徵收制度之一大變革。作者以其性質重要，爰本討論食詳認識愈深之義，特就田賦改徵之利弊，作一客觀的簡單分析。

田賦改徵實物，利弊兼有。有利之處，就個人意見所及，其易於認出者爲以下三項：

一曰增加政府收入。田賦由錢幣改折實物，而其折合率如按戰前之物價計算，則因戰期中物價增漲多倍，政府徵得之物品，以貨幣計，自必增加多倍，財政可以較前充裕。

二曰平均租稅負擔。我國田賦，向按徵收定額之錢幣。假定定額稅額時係以地租收益或地租之多少爲準則——即令收益多者多納，少者少納——則此辦法在田地產物價漲或跌落之時，殊難達到原來目的。因爲田地產物漲價則收益增高，跌價則收益減低，而稅額在此兩種情形之下，不便隨時改訂，致無伸縮。實物田賦之採行，可

律的散文；有了胡元瑞王漁洋的神韻論，纔知道盛唐詩的正宗；有了周止庵的「有寄託人，無寄託出」的解釋，纔知道南宋詞的滋味。在戲曲小說這些方面的批評不多，但也不是沒有。傳記文學向來沒有受人重視，所以這方面的批評不成格局。假使我們介紹莫洛亞的傳記文學綜論，更融合了中國固有的理論，我們便不妨期待有新的傳記文學。大家都接受了知難行易的訓示，爲什麼中國文學系不在知的方面，理論的方面，加以必要的指示呢？

最近教育部長陳立夫先生，在樂山召集大學教職員談話，公開地徵求我們對於各科系的意見，指示我們用書面提出。我今貢獻這一點希望，深願陳部長及其他教育當局予以應得的注意。

以予以補救。當物價有所升降，田地收益隨而發生變動時，賦稅之價值亦有同比例之增損。自抗戰以來，一般課稅標的物之價值，多有增漲，其從價徵課之租稅，稅額自能比例地增高；而田賦則因量款計稅之故，雖田地產物價格騰貴，收益加增，而稅額之定，鮮有變更，以致田賦之負擔，對於其他從價租稅之負擔而言，實屬相對減輕。現在如將田賦改徵實物，並按戰前物價折合稅額，那末田賦之負擔，自可與其從價租稅之負擔重新平衡起來了。

三曰便利糧食管理。現時重慶的米價，大約已較戰前高出十餘倍之多，政府的管理工作因而加重，若將田賦改徵實物，而政府又以徵得的糧食，善爲運用，或以接濟軍糧，或以調劑各地供求，或以儲待市價過分高漲之時大量釋出，以收平價之效，那末，實物田賦之採行，自爲有利之舉。

田賦徵收實物，雖有前述三利，但亦非無其弊。第一，就財政而言，在貨幣租稅制下，接收貨幣，事至而易，

中國勞工立法

陳定閔

羅運炎著 上海中華書局發行
二十八年八月出版 七角五分

而在實物稅制下即計量物品，辨驗成色，手續繁瑣，工作困難。至於稅收之保管，實物尤多不便。倘若不肯官吏，於一進一出之際，使用兩項衡量器具，即以老斗量進新斗量出，或且攪雜灰泥，改變成色，則其流弊之大，更不堪言。

第二，實物田賦，如果真按前物價折征，而其收稅方法又係責令人民自運，則人民於納稅之外，復須加納運費，負過或嫌過重。
第三，田賦改收實物之說，鄉民無知，或將懷疑政府輕視法律，因而亦對法幣減少信任。其影響如何，似亦應予考慮。

各關於勞工的立法，為期本不

絕對不能禁止，所以須有立法的保護。中國自

民國十二年以來，即有關於童工保護的規定；十

其長；中國在通方面的努力，歷史尤短。雖則先後制定的法規已不下數十種，但是市面上關於勞工法一類的著作，專講中國方面者並不甚多。

九年工廠法中，更有關於工作種類與工作時間的限制，並有學徒制度的規定。

問題是勞力問題中「最含緊要性的」，而對於決定工資的標準，學者持論不一，各以關於最低工資的立法規定亦有差異。中國的工資情形至為複雜，一般地說，「工廠所給工資與工人正當生活費用不相適應」(五八頁)，所以有最低工資法，勞動契約法及工廠法中最低工資率的規定。

羅運炎先生以身為「立法委員，兼為勞工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於茲六載有餘，對於勞工立法，藉獲參與之機；復於民國二十六年夏間奉派調查全國工廠狀況」後來寫這本書。以著述資格而論，可說是再適當沒有。

第二章述關於女工之立法。據著者說，中國女工的人數超過男工(二五頁)，勞動範圍甚大(二七頁)，工時並不少於男工，而一般工資又甚低落(二八—三〇頁)。她們因為生理關係，「與男工既有不能盡相一致的地方，所以在勞工立法上有特別注意的地方」(三〇頁)。

第五章述關於工場的立法，首論工場之意義及工場對於工人生命健康之關係。中國工場的情形，至為惡劣，其影響所及，實屬不堪設想，所以關於這一方面的立法，如工廠衛生法之安全與衛生設備等，規定都是很詳。

全書共八章。第一章述關於童工之立法。首論童工問題的嚴重及中國童工的情形。據著者調查，以上海言，童工以紡織工業為最多，他們的年齡，「甚至有小於七八歲者，工作時間之長竟達十二小時之上。布廠因不做夜班，有至十三小時半者。所得的工資極微，每天不過三角左右」。

我國立法中對女工之保護，現在也有一些規定，如特種工作的禁止，工作時間的限制，產前產後的休息，以及哺乳的保護等(三三頁)。

第六章述關於工會之立法。工會運動發軔之初，各國多採取限制政策，現在則「都積極予以法律上的保護」(九三頁)。我國之有工會立法，始於民國十八年之制定工會法。在本會中，著者對於工會的組織，似乎看得很重，所以論之甚詳(九七—一〇六頁)。

至於學徒則更苦惱，尤以內地商店為甚」(一〇—一一頁)。童工在事實上

第三章述關於工時的立法。因為工作時間的長短，實與工人的幸福最有密切關係，所以各國工人為了要求法定工時制度，都曾作過激烈的運動。中國在這方面的立法，除了禁止童工女

工做夜工外，還有關於成年男工的工時限制；工廠法中且有關於每日休息，每週休息和假期休息的規定。惟是現行工廠法的適用，不能及於三十人以下的工廠，著者以為難免發生「血汗制」的流弊，確實是有見地。

勞動契約之本身，適其要素，締結的限制，效力及廢止；下半年則以「團體協約亦可作為一種勞動契約」，「似亦不妨合併論之」，故該團體協約的內容。

第八章述論於勞資爭議之立法。據著者意見，罷工事業影響甚大，而中國自「民國七年至十五年，罷工風潮所及之地共一百十六處，罷工次數一千二百三十二回」(一三四頁)，考其原因，多由於經濟壓迫，不良待遇以及羣眾運動所致(一三九頁)。爲了消弭這種風潮，政府已制定了處理勞資爭議的立法，但是勞資糾紛，斷非法律所能完全防止，所以著者說：「欲謀工潮之消滅，固非釜底抽薪，從根本上求解決不可」(一五六頁)。

全書共計二百卅七頁，附錄約占三分之一，正文只有一百五十六頁。以一百五十六頁的篇幅來詳述中國的勞工立法，當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本書的特點之一，是在著者之能刪繁就簡，使其內容扼要明晰。

第二個特點是在研究條文以外，著者並能剖析立法理由，敘述立法經過，兼及實地調查，這使讀者對於本書，不但可以當作法律書看，而且可以當作一種討論中國勞工問題的參考了。

如我們想要求全的話，則也可向著者提出幾點意見：第一、關於失業救濟方面，前曾業於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曾有職業介紹暫行辦法的規定，這也是個勞動法的法源之一，在此具體法規尚付缺如之時，實屬不容忽視，再版時似應提及。其次，第一章附錄中有工廠檢查法，本文

內却未加以討論；這對初學的人，當然是一種缺憾，因爲他們很想聽聽著者的意見。

讀了本書以後，一個細心的讀者，當必感覺中國的勞工立法，尙多不完備處，例如關於勞動保險方面的立法，前廣東省建設廳勞動法起草委員會曾經有過這類的草案，可是正式的國家立法

村中人語

一 楔子

俗語說：「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現在的秀才，因爲能讀中外報雜誌，似比從前的秀才更易明白天下事了。且在抗戰期間，秀才們尤有難免出門的必要，因爲偶一出門，就得花錢。

到頂慶去跑一趟，船費，酒筵費，旅費，車費，旅館費，飯費，應酬費等，算去總是超過了秀才的負擔能力，至少是得不償失。所以我這一個秀才，決定守門內，即使有人三顧茅廬，也不跟着他去，除非肯預付來回旅費。

三百六十一行，到了現在，行行都有生財之道，糧食行和汽車行更是不必說了，言的只是秀才一行。你看：司機穿皮鞋，賢士大夫穿草鞋，眼前的現象多麼滑稽！我，擇業缺乏先見的人，從小受了秀才教育，如今肩不挑，手不能提，除了咬文嚼字以外，確實是別無所長。因此，我尙望準何政行，而願趁此端光發晦時，錄些村中人語。其間雖或插入己見，甚且雜些雜語，但皆老生常談，無裨時艱。倘有失檢或筆誤之處，讀者當能不予苛責，蓋惟村學究

，似尙沒有着手。又從本書的字裏行間，很可看出現行的種種法規，數目雖多，施行仍未澈底，所以效力極微。爲了保障勞工的利益，促進工業的發展，我們一方面固然希望立法當局繼續努力，同時也望行政和司法方面都能注意到這問題。

仲 華

能作村中人語，而村學究又常不夠秀才資格，衡以當代標準，委實不入流品者也。

二 米珠薪桂

村中人談到物價高漲，就說米珠薪桂。可惜外國人不吃米飯，不燒柴火，我們很難拉他們來做個比較。

可是，不吃米飯的外國人，卻曾吃過珍珠。羅馬人最初不識珍珠果爲何物，以爲珍珠就是雨珠；當牡蠣殼開具殼的時候，兩點落入壳內，久而久之，就變成珍珠。埃及女王克留佩特拉曾將珍珠碾碎，混入酒內待客，以炫她的豪富。這有一位羅馬的王孫公子克洛達斯，則將一粒寶貴的珍珠放在一杯醋裏，恭恭敬敬地喝這杯醋，祝賀一位美人的健康。有幾位羅馬詩人提到這一段故事，例如著名的何瑞司就在他諷刺詩第二篇第三節第二三九行說：

「你怎樣說？這種行爲是否更加瘋狂，比將它投入河流成溝渠？」

「兩穀秋雨重」載米價一則：「槐鄉縣
溫公曰：『太平興國時，米一斗十餘錢』，此其
至賤者也。明史李福傳：『永甯宣撫李福明反
攻貴陽，官廩告竭，米升值二十金』，此其至貴
者也」。

著崇明是誰？他的祖先本是保羅人，世居
永甯，爲宣撫司。明憲宗天啓時，以府調川軍
援遼，崇明便乘機作亂，佔據重慶，進犯成都，
被左布政使朱燮元打敗；同時，女將秦良玉亦率
部征討之，崇明乃退至貴州，勾結正年叛亂的水
西土酋安邦彥，自號大梁王，邦彥亦號「裔大長
老」，至崇禎二年，燮元（此時已降任巡撫）調集
湖南四川貴州雲南數省兵力，討崇明和邦彥
殺死。這樣看來，古時米價最貴的地方是在貴
陽；而四川與之毗鄰，受其甚久，當時重慶一帶
的米價，大約也是很高吧。

明代雖有金背錢和通寶金錢，但流通不廣，
使用甚稀；明史所謂「米升值二十金」，恐怕是
指二十兩銀子。按洪武九年納糧，銀一兩折米
一石。過了二百餘年，貴陽一升米賣二十兩，
漲價二千倍，當然是很貴了。

古人用硬幣，今人用紙幣，古斗既與今斗不
同，而今斗又有新老之別，所以很難比較。但
是近日在重慶一帶，一元錢買不了十斤柴，不
夠燒三頓飯（相形之下，桂樹似乎太賤了），大有
「板斧做柴燒，嚇得床兒怕」的趨勢。至於米
呢，去年十一月白沙的米價，每斗（老斗）不過
三元五角，今年十一月旬每斗售至六十二元，
相隔一年，漲價二十倍；假若和二百餘年以前則

米價相較，早已超過二千倍了。選了區署的
干涉，最近稍微跌落，但昨日與今日之市價仍爲
五十五元。村中有八口之家月食白米四斗者，
現在幾有斷炊之虞。

米太貴了，人心惶惶，於是芳鄰相遇，先歎
氣後搖頭，繼問「今日米價如何」？東村一老
翁曰：「古人爲五斗米而折腰，架子搭得還高，
今人即爲五升而米，似也不得不折腰了！」

三 打油詩或打狗詩

俗稱詩中雜以俚語者爲「打油詩」，村中人
望文生義，以爲打油是打麻油豆油，其實不然。
張打油是人名，不知其爲何許人也。宋錢
易「南部新書」云：「有胡釘鉸或打油二人皆詭
誕詩」。明楊慎「升庵外集」謂唐人張打油作
詠雪詩云：「江上一籠統，井上黑窟窿，黃狗身
上白，白狗身上腫」，故打油詩又名打狗詩。

在明朝一個無名氏所著的「詞譜」裏另有一
詞記載：「中原音韻作詞十法，造語不可作張打
油語，士夫不知所謂，多有問予者。乃泚之行
省樣一參知政事，應後作一粉壁，雪中隱隱，見
有題詩於壁上者，「六川飄飄降九霄，街衢街後
盡瓊瑤，有朝一日天晴了，使掃帚使掃帚，使
鐵錐使鐵錐」。參政大怒曰：「何人大胆，敢污
吾壁」？左右以張打油對，張擁至前，答以某
雖不才，素願知詩，豈至如此亂道，如不信，試
別命一題如何？時南陽時團，請張兵出救，即
以爲題。打油詩曰：「天兵百萬下南陽」。

政曰：「有氣傲，壁上定非汝作」，急令成
下三句，云：「也無援救也無糧，有朝一日燒破
了，哭爺的哭爺，哭娘的哭娘」——依然前作腔
範。參政大笑而舍之。以是遠避其名，詩詞
但涉鄙俗者謂之張打油詩，用以垂戒。

唐人詠雪之作甚多，升庵所說的或有其事，
至於無名氏所說的，却就像是穿鑿附會的了。
英文稱劣詩爲「Gone」，字源詳「文字學
專家也考證不出來」，但與「狗」字有關，可稱
爲「打狗詩」，意義兩全。實天湊之巧合也。

四 何以解憂

魏武曰：「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這
兩句話很發不住，李太白就反駁道：「白酒澆愁
愁更愁」！人人不見得都嗜飲酒，天天喝酒就
會眼睛紅腫，傷害肺部和腦筋。何況現在一斤
大德洋六元四，一斤紅毛燒洋三元二，喝酒
就不算經濟了。

西洋人以睡眠是最好解憂劑，有此詩人
稱之爲止痛藥，莎翁稱之曰「保姆」。在西
班牙小說家塞萬提斯的名著「吉訶德先生」第六
十八章內，吉訶德的僕人山差邦說：「現在，但
願福祿落在第一位發明睡眠者身上！睡眠像
外衣一樣，籠罩一個人的全身。思想及其他；它
是飢者之糧，渴者之酒，寒者之熱，熱者之寒。
它是現金，能以賤價收買人間的「不幸」；它是
天平，使帝王與牧童，愚人與智士一律平等」。
後來引用這句名言的很多，例如十九世紀美國漫

詩人薩克新在「早起」一詩中寫道：

「但願上帝賜第一份發明睡眠的人。」

山差那如是說，我也如是說。

睡眠有種種好處，做夢是其中之一。夢見去世的朋友，攜手有歡；三月不知肉味，夢見人家請我吃西餐，或我反請人家來吃山珍海錯，熊掌河豚，既不破鈔，又無中毒的危險。夢見和愛人幽會；夢見升官發財，中了航空獎券或儲蓄獎券；夢見我們果然得到最後的勝利，不但掃蕩將敵人驅逐出境，而且把東瀛三島收入版圖！這些都是很可喜的。驕幸之故，「一睡貪歡」，樂而忘醒；醒後嗒然若喪，如有所失。

近來村人消愁解悶，大半採取這兩辦法：不以花生曬酒，淺斟低酌，便是畫以雜耍，埋頭大睡。倘若二者合而為一，尤為美妙之門：喝得酩酊大醉，任玉山傾倒，鼾聲如雷，不亦悅乎！

最後的補白

無論那一種定期刊物的封面或裏封面上，必定要一目錄，有些刊物的目錄甚至於用紅墨來印刷，醒目至於無以復加，而惟本刊則於應排目錄的席位擺起「龍門陣」來，讀者認為怪事，來函詢問理由者有之，亦求加列者有之，嚴詞斥責者亦有之。在開始的時間，來函不多，編者力能應付，照例是各個擊破。如今形勢突變，箭如雨發，招架不及，只好在此披一開火砲彈。

在未陳述理由之前，我得先行答覆幾位成見極深的讀者：如果你們認為期刊非有一個目錄不

可，期刊沒有目錄就等於人無面目，那末，備有目錄的期刊，雖在紙貴洛陽之今日，還是數以百計，你們儘有選擇餘地，何必要做鬱鬱不樂的本刊讀者？若說內容尚好，不得不看，那末，夠了，閒話可不多說。

惟就一般向來函語公而論，究竟不過引為憾事，並未嚴詞斥責，所以我願平心靜氣地向他們道歉。我只敢說道歉，並不敢說解釋，因為我把目錄刪去，只是「從權辦理」，並非視為原則上應該如此做的。有了此種互相諒解，我們的談判就很容易結束，不至於像日蘇漁業談判之需兩年累月地大費唇舌了。

你們知道現在的紙價嗎？白報紙是每令二百五十五元，嘉樂紙一百三十五元，承印商店還要我們加一點破，於是我們的實際支出便是白報紙每令二百八十元零五角，嘉樂紙每令一百四十八元五角。一令紙可印本報千冊，所以本刊的紙張成本是白報紙每冊二角八分強，嘉樂紙每冊一角四分八厘半。爲了減輕讀者負擔起見，我們不得不一方面做虧本生意，一方面儘量利用可以利用的紙張。在此情勢之下，目錄的地位自然最覺重要。理由不是很簡單嗎？在抗戰以前，人人覺得穿破衣服是很丟臉，如今最講面子的士大夫中間有幾個不叫老婆補褲子呢？本刊之無目錄，實際上是反映着你們的生活；千百年後，若復有份本刊爲一考古家所發現，憑其想像能力，由此刊物之面目不全而推想到諸公今日之衣冠不整，則我今日之孟浪，或許還可使一未來考古家認爲是種有計劃的埋伏呢。

目錄究竟何用？這還比不上「一張公司大菜的菜單」！當你看了一張菜單，發現中有豬排一道，你不愛吃，你還可命廚役換一半排或火腿魚蛋。至於目錄則不然，它是固定的，你不能因厭惡「男士」而命編者換一「女士」；關於「男人」！黑墨落在白紙上面，還有何說？一本刊物的內容，早決定於付稿之時，非如冠生園廚房出品之可隨時聽點，所以我說目錄之功用實際上不及一張菜單。

也許你還要說，封面上有張目錄，檢閱總是方便一些。我不否認此說。但是請問：當你看了「子佳」信後，你究有何所得？子佳是誰？信內何言？有目錄與無目錄何別？我們因爲要看標語愛聽口號，在政治上已經上了不少的當，難道用卷讀書還要先聽口號？目錄不是提要，目錄只是標語與口號。專看目錄而不細閱內容的人，不是沒有；這些是唯名主義者，我不願收他們爲「準讀者」。我曾遇見一位朋友，大談星洲評論，說我居於能論拉利宗白華先生來寫一篇「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委實不易。我引爲同志，和他談論晉人的美。那知道他很老實，自承尚未細看。我只得向他道歉，說：「對不住，如果本刊有一目錄，你還可以免得翻閱！」

古人讀書是要抄背誦的，而今則連字找題目都想另求捷徑了。再過四五十年，誰可保證日報背後不附一個「引得」？時間是已如此地寶貴，將來人的吃飯吃菜，必定先用機器攪爛之，以免咀嚼之煩！（編者）